
第2部

再论竹内好与方法论的范式转换



日本社会长期处于一种“无思想”的状态，新的民族主义思潮近年来也不断高涨，由此导致了日中之间政治关系的恶化。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中国。目前带有相似性的日中两国社会，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成为映照彼此和认识自我的镜子。自19世纪遭遇欧洲的冲击以来，两个国家所选择的不同道路及其结果，对于各自进行的“接受和抵抗”欧洲现代的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竹内好对此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。欧洲的近现代并不是静止的，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地进行着“自我实现、自我扩张”。在这种扩张的压力下，亚细亚被迫走上了“自我丧失”的道路。竹内好认为，亚细亚无法战胜和克服欧洲的这种自我扩张，而为了避免自我丧失的持续，必须“在对失败保持自觉的基础上进行持续的抵抗（挣扎）”。但问题在于，在目前的日本和中国，都再也看不到类似的“挣扎”，都出现了明显的丧失自我的无思想状况。为了抵御“现代”的无止境扩张，从方法上来看，只有立足于各自基层社会存在的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，坚守等身大的意识，才有可能找到出路。

关键词 等身大的世界，常民，自我实现，自我丧失，挣扎

序言

作为日本战后思想界的一位重要旗手，竹内好故去已近30年。今天看来，有些不可思议的是，几乎在1977年竹内好去世的同时，日本社会出现了严重的“思想的终结”、“意识形态的终结”，而这种“终结”状态持续至今也已达30年之久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竹内好的去世似乎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：它意味着日本战后思想的死亡。

到1960年代，由过度的意识形态引起的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席卷了日本社会，以至于发生了1972年的浅山庄事件和联合赤军事件。正因如此，70年代中期以后意识形态的终结可以看作一种反动。这一现象本身并非不可思议，但问题是，随着

时代的变化，支撑着人们生命的“活着的思想”竟然也枯竭了。在这一点上，清水几太郎在1975年对其1963年发表的论文“无思想时代的思想”所作的修改和重刊同样具有象征意义。但在清水看来，上述状况不过是与50年代后期丹尼尔·贝尔所说的“意识形态的终结”相类似，也就是说他乐观地认为“终结状态”仅限于意识形态层面，而且迟早会被克服。

但事态实际上更加严峻。虽然70年代以后连续出现了米歇尔·福柯、梅洛·庞蒂和德里达的结构主义、后结构主义、解构理论等后现代思潮，浅连彰的《逃走论》、《结构与力》在日本也成了畅销书，但这些思潮都决不是支撑生命的思想，而是“写在纸面上的思想”。

另一方面，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进入80年代，由里根和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、权力政治（Power Politics）思潮占据主流，弗里德里克·海耶克、密尔顿·弗里德曼等人的难以称为支撑生命的“思想”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流行。进而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“新思维”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涤荡了社会主义世界，最终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，东西冷战体制迅速走向崩溃和终结。

在这一时期，日本社会在“无思想”的状态下继续对国家政治保持沉默，未能出现80年安保和90年安保。进入后冷战时代的90年代，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的时期，在“国际贡献”论的压力下，日本的国家体制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向海外派兵的道路：从参加PKO、PKF，到1996年重新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（防卫新指针）导致的日美同盟关系强化、日美共同开发MD（防卫导弹）计划、1999年出台“周边事态法案”，进而在2001年“9·11事件”之后制定了“伊拉克特措法”。

另一方面，日本社会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经济停滞和丧失自信的“空白的十年”。作为其反动，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否定所谓“自虐史观”的日本新民族主义主导的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、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”，并由此再次引发了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“教科书问题”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小泉纯一郎政权的长期执政，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更加突出，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等问题，日本与中韩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的趋于密切相反，呈现进一步恶化的态势。而浮出水面的日本民族主义依然是由缺少生命意识的“思想”所支撑的，可以称作“无根无思想的民族主义”。

有关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，是竹内好生前一贯关注和不断发出警告的重大问题。它不仅涉及到日本与亚洲的关系，也涉及到竹内所称的“作为方法的亚洲”的“现代化”的方法论问题。因此，面对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崛起，有必要对竹内好的思想进行重新探讨。

进而言之，在2006年的今天，当北朝鲜发射导弹引发的“危机”被大肆渲染，中国的军事和经济“威胁”也被无意识地鼓噪，以至于出现了攻击敌方基地的“攻击论”主张，迅速酝酿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成了决定着日本未来道路的严峻问题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尤其必须对日本社会在“无思想”状态下演变的真正含义进行深入思考。

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，我个人确信，重新认识竹内好的思想对于突破目前日本的“无思想”状况具有重要意义。为此，于200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（ICCS）主持召开了以“日本、中国、世界：再论竹内好与方法论的范式转换”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。参加会议的有鹤见俊辅、沟口雄三、松本健一、菅孝行、孙歌、张宁、冈山麻子、薛毅、黑川创以及我本人，共10位学者。通过深入的讨论，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。这一部分将参照会议的讨论，以我本人的问题意识为中心加以论述。

[I]

知识分子与内在的民众性

“无思想的状况”初看起来与日常生活中民众的“非政治性”或者说“不关心政治”相对应。但是民众的“非政治性”与社会的“无思想”状况绝不相同。要明确这一点，首先要确认何谓民众的“非政治性”。

非政治的民众在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曾被丹尼尔·贝尔和赖特·米尔斯等美国社会学家描述为Mass即“大众”，¹所谓“大众社会理论”即源于此。这里的大众概念被与明显“关注政治”的市民（Citizen）相对照，进而“大众社会”被用作与“市民社会”相对立的概念。在这里，由于高度产业化导致了社会的均质化（Homogeneous），民众丧失了个性的去主体化被看作大众化及大众社会化的动因。而大卫·里斯曼有关他人指向型的“孤独的群众”的观点，也同样建立于对高度产业化社会